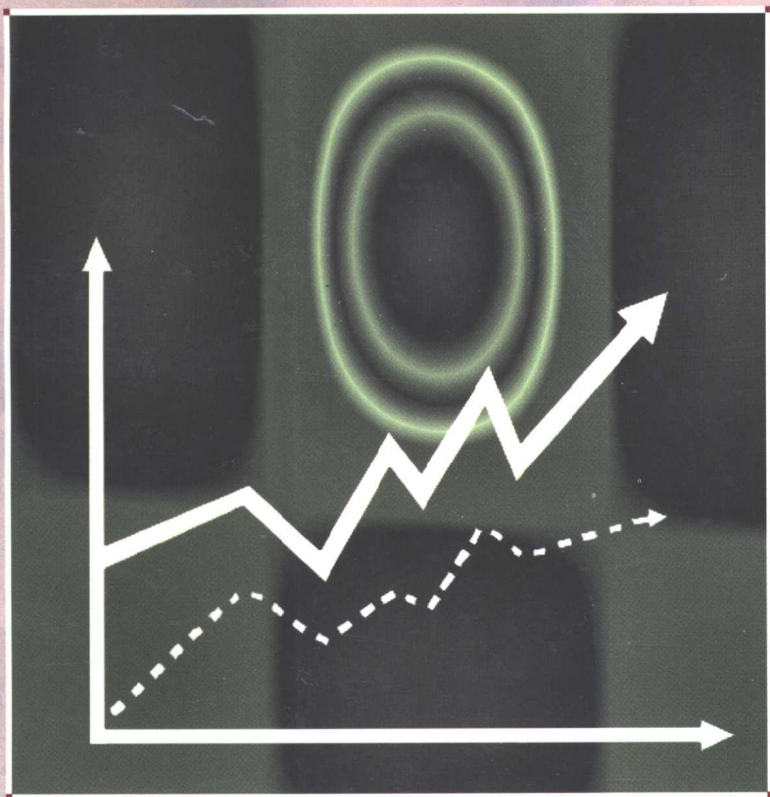


制度经济学

——原始积累及制度变迁问题研究

李露亮 李露钢 著



黄河水利出版社

制度经济学

——原始积累与制度变迁问题研究

李露亮 李露钢 著

黄河水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经济学:原始积累与制度变迁问题研究/李露亮,
李露钢著. —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0.8

ISBN 7-80621-411-9

I. 制… II. ①李… ②李… III. ①经济制度—经济史—研究—中国—1949~②资本原始积累—研究—中国—1949~ IV. F1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0270 号

责任编辑:武会先
责任校对:周宏

装帧设计:郭琦
责任印制:常红昕

出版发行:黄河水利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 11 号 邮编:450003

发行部电话:(0371)6302620 传真:6302219

E-mail:yrp@public2.zz.ha.cn

印 刷: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7.125

版 次:2000年8月 第1版

字 数:16.5千字

印 次:2000年8月 郑州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15.00元

献给我们的母校——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

无论如何，她都是我们精神
的圣地。

11. 11. 11

内 容 提 要

主要探讨中国在近 50 年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的原始积累问题，目的在于构建一种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说明产权结构、国家理论以及意识形态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原始积累与制度变迁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部分 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背景、 经验背景、历史背景

第一章 从莫尔的“乌托邦”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	(17)
0 引言·····	(17)
1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	(18)
2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22)
3 从批判的理论到意识形态的变迁·····	(27)
第二章 苏联的原始积累与苏联模式的形成·····	(32)
0 引言·····	(32)
1 经济的多元化向一元化的转变·····	(32)
2 苏联重工业为主的发展道路·····	(36)
3 苏联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	(37)
4 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39)
5 对苏联模式的批判·····	(43)
第三章 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与解体·····	(46)
0 引言·····	(46)
1 中国变态的封建制度的形成·····	(46)
2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点·····	(49)
3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后果·····	(52)
4 传统封建社会的解体与现代集权制度的形成·····	(54)

第二部分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第四章	一个现代化的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63)
0	引言	(63)
1	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制度	(65)
2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制度	(67)
3	新民主主义社会文化制度	(71)
4	新民主主义的解体	(73)
第五章	制度性积累:农业产权制度的变迁	(77)
0	引言	(77)
1	历史背景	(77)
2	合作化运动	(80)
3	制度因素	(85)
4	意识形态因素	(88)
第六章	制度性积累:对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	(91)
0	引言	(91)
1	历史背景	(92)
2	改造过程	(95)
3	制度因素	(98)
第七章	制度变迁:国家管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104)
0	引言	(104)
1	历史背景	(104)
2	全国计划管理工作的开始	(107)
3	经济计划编制的程序化与规范化	(110)
4	计划体制的确立	(114)
第八章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与中国实践	(118)
0	引言	(118)

- 1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前提 (119)
- 2 制度性积累与政策性积累 (122)
- 3 原始积累的后果 (126)
- 4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比较 ... (128)

第三部分 计划体制内部的冲突与危机

- 第九章 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社会批评资源的丧失 ... (133)
 - 0 引言 (133)
 - 1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工作重点的转移 (133)
 - 2 1957年的反右与我国主要矛盾的再一次转变 (135)
 - 3 大跃进时期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 (139)
 - 4 庐山会议 (141)
- 第十章 传统计划体制的危机 (146)
 - 0 引言 (146)
 - 1 意识形态的危机 (147)
 - 2 政治领域的危机 (150)
 - 3 经济领域的危机 (153)

第四部分 原始积累的终结与现代化变迁

- 第十一章 市场化——从集中到分散的制度变迁 (161)
 - 0 引言 (161)
 - 1 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 (161)
 - 2 传统计划体制的解体——从集中到分散的过程 ... (165)
 - 3 从集中到分散的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原理 (172)
- 第十二章 企业理论与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 (178)
 - 0 引言 (178)
 - 1 现代企业理论与现代企业制度 (178)
 - 2 国有企业的困境 (183)

3	国家经济职能与国有企业功能定位	(188)
第十三章	强意识形态结构的形成与解体	(195)
0	引言	(195)
1	近代中国重构强意识形态结构的努力	(196)
2	强意识形态结构的形成	(199)
3	强意识形态结构的解体	(203)
第十四章	制度分析的意识形态原理	(208)
0	引言	(208)
1	作为制度理论基石之一的意识形态理论	(209)
2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原理	(212)
3	作为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原理	(216)

绪 论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超稳定结构,由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构成的经济基础、由封建皇权与科举制度构成的政治结构、由封建王权思想与儒家思想构成的意识形态,相互配合,曾延续了2 000多年。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经济、军事、文化的挑战与侵略下,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逐步走向解体。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粉碎了地球上其他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即使在今天的国际秩序中,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以大压小,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走向工业化与现代化,成为经济上落后的民族寻求自救的惟一道路。

对一个农业国家来说,要实现工业化,首先需要资源上的原始积累与制度上的支持。因为积累是持续的大规模投资的前提,持续的投资又是工业进步的基本条件,而积累与投资活动又必须在制度安排的基础上来进行。由于资本主义在其原始积累过程中的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性与侵略性,落后的农业国家成为先行工业化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与掠夺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更为艰难。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就是外国资本主义从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侵略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压迫、寻求自身工业化道路的历史。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才有可能在不受帝国主义外来压迫的主权国家的框架内寻求自身工业化的途径。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选择了苏联模式,以其政权的力量,在“一五”时期急速改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化框架,通过制度变迁,

建立了单一公有制的产权结构与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模式，确立了自身原始积累与工业化的道路。

这种制度性原始积累，必须以指向工业化的新型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确立为其思想前提，以国家强有力地行使其垄断性制度安排权力为其政治前提，以产权结构提供的激励为其经济前提。需要指明的是，在中国，这种意识形态、国家理论与产权结构的导向，是以一种远期的人类大同为核心的。它既根源于中国传统社会平均观念的悠久传统，也包含着在意识形态引导下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长远预期，甚至包括大众的非理性预期。在分析最近 50 年以来中国的原始积累与制度变迁时，传统分析工具往往显得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其原因不仅在于其制度分析方面的薄弱，也不仅在于其效率为主要的思想的局限性，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迄今为止，经济学还缺乏对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非理性预期的深刻透视，尤其是不甚了解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下的民族心理。而上述被忽略的方面，恰恰是大陆的中国人选择自身工业化道路、意识形态与制度模式，并为了远期目标而作出了重大牺牲的根本原因。1840 年以后，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以后的北洋军阀北京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都未曾做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根本转变，因为它们都未曾完全建立起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意识形态条件、国家权威与产权制度。1949 年以后的中国，通过意识形态、国家结构、产权制度的革命，为工业化与现代化所必需的原始积累提供了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最初的条件。这一过程，从 1949 年开始，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与探索，在坎坎坷坷中先后实现了从内乱外患的旧中国向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制度向单一公有制、计划配制资源、国家积累与国家投资的体制的转变；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又实现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目前的社会价值观念、国家政策导向与产权框架，为中国在行将到来的 21 世纪中加速实现工业

化与现代化做好了准备。

就中国来说,1949年以后,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而导致的原始积累与制度安排,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作用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另一方面,它又直接导致了中国从多元化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到一元化的计划体制的变迁。在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思想文化体制由于国家的集中管制而迅速走向一体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构成了20世纪高度集权的国家制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受到极大的限制,社会的一切生活服从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社会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形成的社会一体化结构。实际上,这种一体化结构构成了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特征,并使得以集中计划管制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国际生活中不容忽视的力量,与以契约自由为特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00多年前西方列强可以在中国随心所欲烧杀掠抢,今天,中国人可以在一个较平等的层面上与最发达的西方国家进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交流了。如果我们再把时间推延100年,对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意义可能就更容易判断。

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重要变化,集中管制的经济体制迅速解体,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成为工业化国家以及走向工业化国家的共同特征。苏联、东欧、中国的这种变化,从自身来说是迈向现代化的又一次重大体制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国家摆脱西方国家的奴役,选择自身工业化的道路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而当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基础基本具备,并向更高的现代化迈进时,又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市场化道路。如果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那是很肤浅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同意关于制度创新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政府的观点。实际上,尽管整个社会主义阵

营的改革,从形式上表现为由最高层领导人倡导与发起的自上而下的过程,但从更为深刻的层面上看,则有更为复杂的缘由。如果不是计划体制内部发生了重大危机,如果不是这种体制本身就是这些国家工业化的序曲,如果不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政治生活的民主、经济生活的富足、思想文化生活的自由的渴望,我们就难以理解这种如此深刻而伟大的变革。中国以经济体制为先导的社会改革过程,可以看做是传统计划体制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后的社会选择或制度变迁。这一过程,不仅可以看做是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从国家管制向契约自由的过渡,同时也是从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过渡、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这确实是中国走向新世纪的重要契机。

本书的基本内容,就是探讨中国在近 50 年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的原始积累问题与制度变迁问题。正视这种创造性的制度变迁,正视它为民族工业化取得的功绩,发现它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局限性与隐患,它在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可能出现的危机,对正走向现代化、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来说,是有意义的。

本书的方法论目的,在于构建一种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以说明产权结构、国家理论以及意识形态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原始积累与制度变迁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属于制度分析的范畴,而不局限于实证分析。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性方法,在于力求用可检验的经验材料来说明问题,致力于“是什么”的问题研究以及经济数学模型的建立。当实证科学成为时尚之时,经济学披上了“实证”的外衣,很有一种狐假虎威的味道。但是,不考虑意识形态因素、非功利性价值判断因素、理性预期与非理性预期等因素,要了解中国最近 50 年的历史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事件与自然事件不同,“历史事件之所以成其为历史事件都是由于它有思想。”“在历史事件的这种何以和怎样的背后,就有着一一条不可须臾

离弃的思想线索在起作用”。“史学的目的就在于把过去的思想组织为一套发展体系。”^[1]由于我国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意识形态率先变化引导下不断发生的制度变更,缺乏较稳定的社会生活样本,传统实证方法就显得尤其不适用。

制度分析经由哈耶克、科斯、诺思、布坎南、钱德勒、张五常等人的努力,把制度变量、交易成本、意识形态,甚至社会自由等因素引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之中,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分析的工具,拓展了经济学的领域。但是,制度分析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以成本—收益分析统一个体行为与政府行为的努力,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妥协,并且冲淡了意识形态因素在制度分析中的作用(诺思除外)。这样,会给制度研究设置致命的障碍。实际上,对国家计划管制的体制来说,意识形态以及最高决策者的价值观念,民众对意识形态的趋同以及非功利性预期,直接影响了决策的内容与社会演进的路径,它在社会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要比自由、民主的决策程序中的意识形态与个人意志的作用大得多。这样,我们必须考虑在过去几十年间意识形态对社会进程的影响。对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以及1949年以后的社会变革来说,意识形态始终是确认革命合理性的关键,是动员广大群众参与、支持、服从制度性变革的源泉,是国家进行产权制度安排的思想前提。在这一过程中,受意识形态的引导,价值驱动常常起着比利益驱动更为重要的作用。

诺思教授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把制度变迁理论作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并把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作为这一研究的基石。他认为,在说明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问题时,马克思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分析工具。他指出,虽然知识和技术存量只是规定了人们活动的上限,但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率。由于国家界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因此,理解制度结构的两

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又由于任何经济组织都会存在搭便车现象或外部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构造一个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从经济性上讲是一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引导,在组织与集体内部达成一致,不仅可以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也有助于克服外部性问题。^[2]通过意识形态、国家理论、产权结构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可以避免编年史、统计资料以及传统经济分析方法的制约,从而可对经济史进行合乎逻辑的编队。

任何一种体制的内在矛盾,产生于它确立的那一刻,只是在这一体制产生之日,它有着生存的活力与积极的历史功能。随着社会的进步,传统体制的运行成本就变得昂贵起来,对实现原初的目标来讲,它就成为不经济的形式。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的道德超越性特征,它所能维持的个体牺牲是有限度的,终会导致个人与社会之间在收益与费用方面的不均衡,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就会增大。此时,新的制度创新的要求就会自发地产生。如果决策者维持原有制度的预期收益高于维持原来制度的费用,或者创新制度的预期收益低于新体制的运行成本,那么,传统体制还会得到维持;如果维持原有制度的预期收益低于维持原来制度的费用,或者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高于新的体制的运行成本,并在社会达成基本的共识时,新的制度创新就到来了。这一过程的发生机理,非常类似科学革命。

制度变迁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预期收益更高的制度或目标模式对先行制度结构的替代。制度变迁包括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类型。诱致性变迁的主体是个人或较小的集团,他们受在现行制度下无法获得而在另一种制度下可能获得的潜在利润或外部利润驱使,自发地寻求对现行制度的替代或创新。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自发的互助组,70年代末安徽自发的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等,都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变迁的主体是国家,

它受在现行制度下无法获得而在另一种制度下可能获得的潜在利润或外部利润驱使,通过政府命令与法律的引入,可以依靠强制力来推行。例如,50年代中期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诱致性变迁与制度性变迁,林毅夫有着较深入的研究^[3]。为了说明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问题,有必要对1953年以来的社会制度变迁进行认真的回顾与反思,有必要对国家管制、国家积累、国家投资的制度问题进行探讨。

原始积累概念在本书中是作为工业化的物质前提来界定的。社会主义作为工业化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必须有其原始积累过程。这一原始积累包括两种形式:一个是制度性原始积累,即国家凭借其对产权重新安排的垄断性权力,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使国家成为社会主要经济资源的支配者。例如,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变非公有资产为国有的或集体所有的资产;另一个是政策性原始积累,即国家利用其再分配的经济职能,通过转移支付,使国家成为社会某些经济资源的支配者。例如,商业的垄断导致的城乡不平等交换、国民收入分配中持续的高积累、低消费政策等。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原始积累概念,最早由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新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站在“继续革命论”的立场上,主张为了给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物质基础,必须对包括小农经济在内的一切私有制形式的经济成分进行剥夺。他指出:“我们把国家手中的主要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种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中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4]尽管这种托洛斯基式的主张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且“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概念成为一种忌讳不再被人提及,但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际运作中与普式的政策主张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诚如亚·齐普科指出的,“如果再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著作,大家将会发现,斯大林实

际上在很多方面都在重复他的思想。”^[5]中国也不例外。

原始积累与一般积累的一个根本不同点在于社会政治权力的介入,正是这一点不仅对社会经济生活,而且对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诚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说,“我们不仅可以谈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而且如果我们不理解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在苏维埃经济中所起的中心作用,我们对苏维埃经济的实质就一窍不通。”^[4]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基于如下背景:资本主义工业化体系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传统的农业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掠夺对象。对此,传统农业国家必须寻求自身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道路。因此,摆脱殖民统治,寻求民族独立,建立具有民族主权的国家,就成为这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社会政治前提。而从制度上与政策上积累国有财富,高度强化国家的经济职能,成为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的生命线。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看做是后起的走向工业文明的民族国家。

由于存在着制度性积累与强制性变迁,除了依据革命政权的政治、军事权威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进行直接剥夺外,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结构,依据其思想权威与道德权威,进行制度性积累,即凭借意识形态的思想权威,顺理成章地对其他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凭借它的道德权威,对民众产生极大的感召力。通过这种意识形态结构,一方面,从理论上准许制度变迁方案,把它转化为社会最为正确的声音,并使社会知识系统对未来制度的公平与效率均有较高的确信;另一方面,从道德上感化广大民众,使他们最大限度地支持、服从、参与制度变革,把它转化为社会最为普遍的声音,并使社会价值系统及民众对未来收益的公平与效率均有较强的预期。1953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1966年起的十年“文化